
1942—1943 年宋美龄访美 与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朱坤泉

1942 年冬, 宋美龄以治病为名飞往美国。在美国的半年多的时间里, 她充当了国民政府外交特使的角色, 在美国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并对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某些特殊的影响。考察和剖析宋美龄访美的背景、过程及效果, 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去理解抗战时期中美关系深层面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同样有助于理解国民政府对美关系的某些特性。

—

宋美龄访美是在战时中美同盟关系龃龉迭起、两国政府正力图寻求某种方式以缓和矛盾、弥补裂痕的情况下提上日程的。

1941 年 12 月 7 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美战时同盟关系建立。美国政府权衡欧亚战局, 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 确立了目前和未来新的对华政策。在军事上, 1941—1942 年之交, 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会商盟国反法西斯战争总体战略时, 确立了集中力量首先击败德国的“先德后日”战略。为此, 通过援助中国抗战以拖住并消耗日军主力是美英得以腾出手来全力投入对德战场的保证。而

(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16 页; (美)威廉·P·希德:《美国在中国的逗留》(America's China Sojour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2—1948), 美国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第 15 页。

且,中国还将是盟国最后击溃日本的最佳陆上基地。在政治上,美国政府决心培植一个亲美的中国,使之在战后能代替日本及欧洲老牌帝国在亚洲的地位,成为华盛顿在国际政治中心尤其是遏制苏联在亚太地区影响方面的一张政治王牌。为了保证“先德后日”战略不受干扰,华盛顿会议上成立的盟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及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将建立大国联盟倡议最早、呼声最高的中国国民政府拒之门外,尽管后来国民政府对此屡有争辩,但上述机构终未向中国敞开大门。为安慰中国国民政府,华盛顿会议决定成立以蒋介石为盟军统帅的包括东南亚部分地区在内的中国战区,美国不久即派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的参谋长。但史迪威到任不久,1942年5月初,毗邻中国大西南的英属缅甸为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退守西南后经由滇缅公路取得外援的唯一对外通道被切断,这是对国民政府的一大打击。蒋介石一腔怨言,将缅甸沦陷归咎于美英对中国战区的轻视、援华不力及史迪威指挥失误。之后,中国与美英之间、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在对日军事合作的一系列问题上摩擦不断。蒋介石甚至扬言,如果盟国一再置中国的要求于不顾,中国将不得不取消这个战区而作“自我调整”,或许就是对日媾和。

为了鼓起中国政府的抗战信心,维持中国抗战,罗斯福总统一面下令开辟从印度盟军基地经由喜马拉雅山上空通往昆明的空中补给线(即著名的“驼峰线”),一面又屡派高级幕僚访问,以加强沟

《中国的纠葛》,第60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13),台北中央日报社,第49页。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4—37页;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1—92页。

参见(台湾)梁敬𬭚:《史迪威事件》,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5—56页; (台北)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第五册,第121—122页。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48—449页。

通，缓解国民政府对美英的疑忌和怨愤心理。7月底，罗斯福的行政助理柯里受命访华，与蒋介石等就盟国合作及扩大对华援助举行了十多次长谈。10月初，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位使者威尔基又飞抵重庆。国民政府寄望于通过罗斯福的来使们推动华盛顿改变对华政策，因而对威尔基等的来访倾注了热情。在一系列气氛融洽的会谈中，威尔基忠告蒋介石夫妇，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欲转变政府对华政策，必须设法影响并引导美国舆论。但较之英国，中国在美之宣传确实“相形见绌”，终致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之艰、牺牲之巨、贡献之大和求助之亟知之甚少。因此，他竭力主张蒋夫人往访美国，认为宋美龄以其炽热的信念、驾驭舆论的智慧和才干、优雅怡人的女性魅力，必将成为“十全十美的大使”，为美国人民尊敬和钦慕。宋的访问“对于我国人民了解亚洲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宋美龄怦然心动。

威尔基回美后，立即向总统游说，并就访华观感向全美发表了“真挚感人”以致“无不动容”的广播演说，美国舆论界“反应非常强烈”。这为宋美龄访美作了很好的舆论铺垫。在这种气氛下，罗斯福总统致力于抚慰国内正在上升的要求加强援华的民众情绪，并寻找机会对屡有怨言的中国政府有所补偿，10月26日，他致电蒋介石，称威尔基此次中国之行对协调两国在战争问题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将有“莫大之补益”，并发出了“深望能有一日欢迎尊夫人来美”的邀请。

接着，国民政府立即就宋美龄赴美进行了紧张的安排。11月16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称宋美龄“非仅为中之妻室，且为中过

威尔基对此曾留有生动的回忆，参见威尔基：《天下一家》，（重庆）中外出版社民国三十二年译印，第68章。

（台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引作《战时外交》（一），第758—764页；《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79页。

参见（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539页。《战时外交》（一），第779页。

去十五年中共生死 同患难之同志……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者也”。18日，宋美龄以养病为名登机赴美，在纽约疗养两个多月后，于1943年2月间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全美穿梭外交活动。

二

横跨美国东西部的全美巡回演讲，是宋美龄访美的一件得意之作，它在美国舆论中激起的轩然大波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令瞩目于对德战场的美国政要们也不无惶恐。美利坚国土上刮起了一阵来势不小的“宋美龄旋风”。2月18日，宋美龄在罗斯福总统夫人及副总统华莱士陪同下，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她是被允许向美国最高立法机关发表正式演说的第一位东方女性，其演讲实况经美国四大广播公司向全美转播，演说词被美国各大报纸全文刊载。第二天，罗斯福在总统办公室为之举行盛大的记者招待会。3月1日，在由美国出版业巨头卢斯和工商巨擘洛克菲勒等组成的“纽约各界欢迎蒋夫人委员会”的安排下，宋美龄在纽约市政厅发表演说。第二天，她又被迎往纽约麦迪逊广场为一万八千多美国听众进行演说。听众中除纽约各界名流外，还有美东部九州州长。随后，她又北上波士顿，出席当地政府为之举行的万人欢迎仪式。3月22日，宋美龄在连接美国东西部的枢纽城市芝加哥市体育场为二万七千多美国民众上了生动的一课。3月27日，宋美龄在西部港口城市旧金山市政厅为一万二千多人演讲。接着，宋美龄一行又南下风光旖旎的影城洛杉矶。4月4日，在著名的好莱坞圆形竞技场，宋美龄向三万多美国听众发表演说……在匆匆行程中，宋美龄还顺道访问了她的母校——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和乔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的青少年时代主要

《战时外交》(一)，第781页。

是在这里度过的。6月初，宋美龄又应专程来美的加拿大首相之邀访加，并对加国会发表了重要演说。在前往全美各地演说的间隙，宋美龄还参加了数不胜数的欢迎宴会、记者招待会，接受了名目繁多的荣誉称号。所到之处，当地政府要员、各界名流几乎全部出动……宋美龄一时成了美国社会妇孺皆知的人物。

对于宋美龄在全美的演说，蒋介石期望甚殷。2月中旬宋美龄步出医院踏上赴全美演说之途的前夕，蒋介石屡电夫人，提示要点：演说措词宜不亢不卑，演说内容应注重：（一）从历史上看，中美传统友谊“非任何各国关系之所可比拟”，美国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中唯一“无侵略我领土之行为”的国家，而且“时时领导各国”以“恢复中国主权”；（二）推动美国舆论“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再次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如果两国“步骤不一，宗旨不明，必授侵略者以隙”，则太平洋永无太平，中美两国必深受其害；（三）战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至太平洋，中国的经济开发需要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机械设备，而美国的资本、技术及产品也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中美经济上的互利互补将使两个大国“百年内之经济皆无虑其缺乏”。且作为有着共同政治制度又隔洋相望的两个“民主”大国，无疑将成为“太平洋永久和平之两大柱石”。奠定其基础“责任则全在吾辈”，全在战时。很清楚，蒋介石试图扭转美国的“重欧轻亚”政策和“先德后日”的军事战略，这是促使美国政府在实际政策中重视中国的地位和利益，从而使国民政府获取更多实际利益的前提和条件。

宋美龄深谙蒋的意图，而且充分调动她早年在美国学到的文学、历史、心理学、演讲等可资利用的知识和技巧，以娴熟优雅的英语表达能力、美国化的谈吐风格和交往方式，把美国民众的情绪引向她希望的目标。在全美各地的演说中，她除了强调所谓中美传统友谊、致力于迎合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期望外，着重阐述了下面

《战时外交》(一)，第790—791、792—793页。

两个问题

其一，申述中国抗战之艰、牺牲之巨，委婉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上的失策。宋美龄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之淫虐狂暴”，中国军队在装备低劣、又无外援的情况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浴血奋战，寸土必争，虽伤亡极大，但“气不稍衰”。她控诉了日军在中国的野蛮屠戮和疯狂轰炸，解释了中国政府如何利用时间空间的有利因素使敌人为“夺取之每一寸土地”必付出“重大之代价”。宋美龄谴责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的姑息纵容，认为“当日倘能对东北事件采取明智之主张，当日倘能阻遏侵略于萌芽，则今日全世界当不致遭受战争之惨祸矣”。她说：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时，西方置中国的一再呼吁于不顾，且“咸认中国无一线之希望”，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而今，又有人对中国政府长期抗战政策抱有疑虑，甚至报以嘲讽。试问：“在现代世界，有何其他国家人民，果真如中国人民，忍耐战争痛苦如此长久如此英勇？维护其所信仰之主义如此强固如此坚贞，而况作战装备又如此悬殊乎？”如果中国的抗战意图至今尚不为世人理解，则“吾人被炸之城市、被毁之村庄，以及无数横遭残杀之男女与孩童，其灵魂将于何日而可得安慰乎？”宋美龄还批评了美国政府中一些人对维护正义和平及援华抗战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

其二，盟国“先德后日”战略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美国应扭转观念，重视对日战场。宋美龄指出，与过去过高估计日本的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美英现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击败日本为目前比较次要之事，而吾人首应付者，则为希特勒。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应该看到，“日本乃一顽强之民族”，它现于各占领区所掌握之

《战时外交》(一)，第800页。

《战时外交》(一)，第829页。

《战时外交》(一)，第814页。

《战时外交》(一)，第829页。

参见《战时外交》(一)，第795—796页。

战略资源“较之德国所掌握者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此种资源而不争抗，则为时愈久，其力量亦必愈大”；如此“多迁延一日”，盟国最后击溃日本的代价则必愈巨。即使从反侵略各国的整体利益着眼，“吾人亦不宜继续纵容日本，使其不独为一主要之潜在威胁，且为达摩克里斯头上之悬剑，随时可以降落”。如不铲除这一主要威胁，则“日本侵略恶魔继续为祸之可能，依然存在”，盟国不应视对日战争无足轻重。中国抵抗侵略为时最久，牺牲最重，尽管如此，中国对于在整个战争中自身所负之各种责任“深切明了”，对于如何觅得种种权益“则从未计及”，中国也决不循生意场上之市侩行径。宋美龄提醒美国舆论注意：中国抗战“非只为吾人本身”，而且与反侵略各国休戚相关。科学已将距离缩小到如此程度，“以致凡影响一民族之事物，势必同时影响其他一切民族”。正是由于中国的艰难抵抗牵制了日本，才使美国“有从容准备防御之时间”。换言之，中国抗战决非可有可无，它的受挫或动摇终将使盟国付出高昂代价。

宋美龄的巡回演说在全美产生了巨大反响。宋在美国国会的著名演说被认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将她推作封面人物。《纽约时报》等大报及国会领袖给宋美龄以极高评价，甚至誉之为世界著名女政治家。普通美国民众也几乎无不以一睹宋的风采、亲闻宋的声音为幸事。宋的随从董显光等平均每天要处理上千件来自全美各地、各个阶层民众的慰问函、汇款和礼物……宋美龄风靡了美国。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她在美国“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

《战时外交》(一)，第 799—780 页。

《战时外交》(一)，第 801 页。

《战时外交》(一)，第 800—801 页。

《战时外交》(一)，第 832 页。

《宋美龄侧写》，华文出版社 1988 年，第 220 页。

《宋美龄侧写》，第 221 页。

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没有受到过的待遇”。特别是,宋美龄演说活动产生的轰动效应鼓起了美国民众中要求重视和援助中国抗战的普遍情绪,这就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制约作用,进而推动了罗斯福决心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入世界“四强”的行动步骤。为表示对宋美龄访美的重视,罗斯福还破例请宋三次住进白宫。在这种气氛下,美国的一些援华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国会在宋美龄演说后即提出废除带有歧视性的限制中国向美移民的法律提案,经有关立法程序,至该年年底成为正式法案……但同时,美国军政首脑也为宋美龄对美国舆论施加的独到影响而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这位既成功又有说服力的宣传家”因“鼓吹援助中国抗日的言论影响之大”,可能会“动摇美国的欧洲第一的战略”,“使(美国)基本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致罗斯福总统私下里提醒他的幕僚要“疏远”她,并“切望使她离开美国”。

三

宋美龄一只手正驾驭调控着美国的民众情绪,另一只手又试图介入和影响美国最高决策层对华政策的发展方向。后者的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围绕收复缅甸及美国飞机援华问题的交涉,以及围绕预商战后问题而为开罗会议铺路架桥。

其一,奉导美国军事援华政策向陈纳德的计划倾斜,推动华盛顿在盟国联合收复缅甸的方案中起主导作用。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00页。林德伯格是1927年不经停留只身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

参见(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8页。

参见《蒋总统秘录》(13),第49页。

参见(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554页;(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4页。

1942年5月缅甸的沦陷及中国入缅远征军惨遭重创,严重挫伤了蒋介石对盟国合作的信心。蒋称“所谓同盟与互助,皆属虚妄之言”,中国已为“虚空之情感义务所误”,他乃决意“戒慎自重”,保存实力。因此,蒋介石对史迪威提出的通过改革和整训中国陆军以收复缅甸的计划百般掣肘,同时又完全接受了“飞虎队”将领陈纳德提出的全力争取美国飞机援华通过确立空中优势和夺回制空权以遏制并最后击溃日本的军事构想。出于上述目的,蒋介石于6月底向美方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包括美在华作战飞机必须达到500架的水平,以及只有美英盟军在孟加拉湾实施大规模两栖作战以牵制缅甸日军并切断其海上补给线,中国军队才能按史迪威的计划参加收复缅甸的军事行动。

宋美龄甫抵美国,就致力于贬抑史迪威以抬高陈纳德,为其“空中打击计划”周旋游说。她对前来机场迎接的总统顾问霍普金斯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他受蒋之命指挥中国入缅远征军却“惨遭覆没”,他“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同时,她对陈纳德“表示极端的钦佩”。之后,她又向来医院探访的美国官员强调,美国应优先考虑中国对作战飞机的要求,缅甸战事“俟有充量飞机后,始能开始反攻”。她还告诫说,收复缅甸计划唯有经充分准备,美英盟军在孟加拉湾与中国军队南北应合,始可驱缅境之敌,解中国之围。霍普金斯透露说,美英按计划将于1943年3月向在缅日军发动反攻。

1943年1月中下旬,美英首脑及其军事参谋人员在北非滨海

转引自(台北)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五册,第121—122页。

《中国的纠葛》,第58页。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48—449、457、489页。

史迪威是蒋的参谋长,又身兼驻华美军司令并主管美对华租借物资援助,陈纳德受其指挥和约束。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274页。

《战时外交》(一),第786页。

《战时外交》(一),第786页。

城市卡萨布兰卡举行盟国军事会议，斯大林被邀参加但因故未往，蒋介石却未获邀请。身在医院的宋美龄为罗斯福、丘吉尔明显地使蒋介石难堪的做法大光其火，电蒋称这“未免太显露将来趋势”。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为确保地中海及筹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对军需物资的庞大需求，将原于这年春发动联合攻缅作战的计划延至这年11月举行。为安慰蒋介石，罗斯福在会议刚结束就派出美空军司令阿诺德率领的军事代表团飞往重庆，向蒋解释变更攻缅计划的缘由，还带去了加强空军援华的许诺。蒋介石要求美方满足三个条件：建立由陈纳德独立领导的美国在华空军；“驼峰线”月空运量达到1万吨；至11月份，美在华空军必须达到500架作战飞机的水平。蒋又电示即将出院前往华盛顿的夫人，就他的上述要求“有便与（华盛顿）当局婉言之”，如飞机援助太少，则“不能发生作用”。2月中旬，宋美龄抵华盛顿，与罗斯福及其幕僚就蒋的要求进行频繁磋商，并诉说了史迪威与蒋的僵硬关系，指责他对蒋持“公然极端轻蔑”的态度，暗示陈纳德更具合作精神。在敦促美国加强对华空运和飞机援助的同时，她又要求美国必须派部队参加缅甸战役，以促使对收复缅甸缺乏热情的英国作出响应。为了鼓起蒋介石政府对盟国的信心，抚慰宋美龄访美特别是在美国国会演说后社会舆论中日益上升的援华呼声，并为盟国最后以中国为基地轰炸和击败日本作准备，3、4月间，罗斯福作出了援华政策向陈纳德的空军计划倾斜的一系列决定：一俟中国地勤设施达到相应水平，美国将加强陈纳德在华空军；扩大驼峰线援华空运物资中拨归陈纳德支配的份额；3月8日，他下令原由陈纳德挂帅的美

《战时外交》(一)，第787页。

《中国的纠葛》，第64—65页。

同上，第65页。

《战时外交》(一)，第790页。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04页。

(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战时外交》(一)，第789页。

空军驻华特遣队扩建为第十四航空队，陈耀升第一任少将司令。

不仅如此，蒋介石进而要求罗斯福召回陈纳德面陈其空中打击计划。4月底，罗斯福同时召回史迪威与陈纳德，听取他们对亚洲军事问题的申述。宋美龄接到蒋的电报后，顾不上刚从美国西海岸回到纽约时一身的困顿劳累，5月初又往华盛顿住进白宫，与罗斯福等连日晤谈。其时，宋美龄长兄、身任中国国民政府外长的宋子文也在华盛顿积极活动，与霍普金斯、马歇尔等频繁洽商。经谈判交涉，罗斯福答复宋美龄：迅速使“驼峰线”日空运量增至7000吨，陈纳德将得到其中的3000吨，并尽力使“驼峰线”月空运量达到万吨；为陈纳德提供2个空军大队的飞机及装备设施；将来反攻缅甸所用之“空中堡垒”远程轰炸机均归陈纳德指挥，史迪威不参加反攻事宜。此外，罗斯福还批评史迪威“对待蒋委员长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这有损于蒋作为一个大国领袖的地位和威信。显然，史迪威的地位受到了削弱，陈纳德的影响得到了加强。会谈中，罗斯福又道出了美英拟放弃已向中国许诺的11月份发动联合攻缅的计划，原因是美英在欧军队无法大量抽调至亚洲，特别是缅甸为英属地，美军赴缅须经英政府允许。宋美龄连日力争，称盟国如不履行攻缅诺言，就不能重开滇缅路，将给养输进中国，盟国以中国为基地最后解决日本的计划将付诸空想；而且，屡毁约诺，也使中国政府无法向中国军民交代。罗斯福最后表示，美将派二师部队前往缅甸，帮助中国方面打通并维持中缅印新交通线。宋美龄愤愤电告蒋介石：推翻攻缅计划“尽是英人在中作祟”。蒋立即复电要宋美龄在盟国联合攻缅计划上“切不可谦让”。但宋自知美英

参见(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558—559页；《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15页。

《战时外交》(一)，第835、837页。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554—555页。

《战时外交》(一)，第834页。

《战时外交》(一)，第835页。

取消攻缅计划势难挽回, 劝蒋但求“逐步进行”, 并称“妹认为美国人心理, 当我方(抗战)有相当成绩表示, 则届时美方必定乐于协同进行全部反攻计划也”。联合攻缅计划终因各方牵制而告吹, 但美方履行了帮助打通并维持中缅印新交通线的诺言。

其二, 关于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初步谈判及为蒋介石赴会开罗铺设道路。

1942—1943年, 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之年。胜利之期的迫近突出了战后问题的重要性。战后问题不仅攸关中国国际地位, 而且直接影响到蒋介石政府在国内的统治。抗战中后期, 国民党政府统治已病入膏肓, 政治腐败及通货膨胀迅速发展, 抗日军事消极。危机征兆的频频显现进一步加深了国民政府借助美国支持其国际国内地位的依附心理。

在与美国军政要员们的各种接触谈判中, 宋美龄强调了战后中美密切合作对亚太地区及全世界“永久和平”的奠基性意义, 表示中国政府将热忱欢迎美国全面介入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她特别敦请美国人相信: “中国将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同我们(美国——引者)站在一道。这是由于中国信任罗斯福同他的政策, 并愿意出于这种信任而预先作出许诺。”宋美龄向美国官员申述了国民政府对战后苏联“赤化”中国、对华“渗透”的担心, 暗示中美应对此早作准备。霍普金斯安慰说, 罗斯福总统当有办法约束和对付斯大林, 而且战后苏联国内百废待兴, 对世界虽有“赤化”之心而力有不逮, 中国政府当勿为虑。在与罗斯福及其幕僚的会谈中, 宋美龄几番敦促美国立即采取行动, 建议罗斯福就结束战争及战后问

《战时外交》(一), 第844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国民政府在抗日军事、经济、外交及心理诸方面形成了对美国的特殊依存关系, 这种关系对战争后期及战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参见张忻福、朱坤泉:《论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美依存关系的形成》,《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 第335页。

参见《战时外交》(一), 第784—785页。

题尽快邀请中、苏、英三国首脑举行“四强”会谈。这表明蒋介石政府急于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四强”资格的承认，使之在战争结束前后对国际重大问题享有发言权，并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英首脑已数度会晤，但蒋介石作为主要反侵略大国的首脑之一一直被撇在盟国首脑会议门外，这引起了蒋介石夫妇的愤懑和不快。而罗斯福总统也为盟国在收复缅甸和援华问题上一再食言而感到内疚，担心不尽量满足蒋的要求，将加剧其岌岌可危的地位，担心“他的整个政府有垮台的可能”。因此，他也极愿寻找机会与蒋介石面晤，以消弭分歧，增强合作。

不仅如此，宋美龄进而要求就战后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安全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在中美间取得共识，进而影响英、苏。蒋介石也于6月18日电示夫人，要她就“战后远东和平与善后处理之各种政策”与罗斯福“详细讨论，作一结论带回”。在结束访美前夕，宋美龄又与罗斯福多次举行会谈，双方就战后对日处理问题达成如下谅解：（一）日本侵占之中国东北、台湾、琉球群岛等应归还中国，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但可考虑辟为国际自由港；（二）中美两国共同担保朝鲜独立；（三）罗斯福同意中美合作使用旅顺、大连、台湾等地的军事基地，并允俟中方准备完毕即撤出美军。上述意向勾勒了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谈中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框架，其间包含了中国人民对争取领土主权完整的正当要求，但同样突出反映了蒋介石政府在内政外交中挟外力自重、依靠美国防苏反共的企图。

6月底，宋美龄结束访美，飞返重庆。

参见《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335页；（美）《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02页。

参见《中国的纠葛》，第90页；《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02页。

《战时外交》（一），第854页。

《蒋总统秘录》（13），第50—51页。

四

宋美龄访美虽然不属于政府间通常外交的范畴,但就其影响及给国民政府带来的直接效果而言,却远在通常外交之上。以争取美国飞机援助为例,身为国民政府外长的宋子文长期在美活动,终不得要领,原因之一是“无法与罗斯福见面”;只得转请自己的小妹出面在白宫迳与总统交涉,这才获致具体结果。宋美龄以其身份、才能和知名度在华盛顿官场进退裕如,极大地缩短了国民政府与美国最高决策层之间的空间和思想距离,其效果当非一般外交使节可比。宋美龄对自己鼓动美国舆论、影响白宫决策的能量也颇为自得,认为美朝野“舆论焕然一致”,充分肯定中国之“四强”地位等“均系妹(宋对蒋自称——引者)在美工作结果”。不仅如此,美国政府战时战后的对华政策也给宋美龄以极大的活动余地,特别是美国急于结束战争,寄望于中国政府在对日战争中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它尤其担心万一法国败降的局面在中国重演,陷于中国战场的一百数十万日军就会全力扑向亚太地区的美英军队,这不仅会彻底动摇盟国的整个战略,而且还会使全球战争形势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宋美龄正是充分利用了美国人的上述心理,牵引其政策向着国民政府希望的方向转化,从而强化了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间互利合作的依存关系。就直接效果来说,不仅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援助得到了迅速加强,而且,罗斯福从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的目标出发,很快作出了通过安排与蒋介石的会谈来增进中美关系,改善蒋的政府国际国内地位的决定。宋美龄离美返渝时,罗斯福即致电蒋介石称:在与蒋夫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他感到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就亚洲的军事合作及战后一系列问题作一认

参见《战时外交》(一),第835页。

《战时外交》(一),第842页。

真商讨。是为 1943 年 11 月中美英开罗会议之滥觞。

应当承认,宋美龄访美对中国抗战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她在全美的巡回演说及外交活动有助于引导美国朝野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抗战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推动美国政府适当调整“重欧轻亚”政策,重视援华抗战,并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感动了无数美国民众捐款捐物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宋美龄推动美国政府从军事、外交、政治及经济等方面全面支持国民政府,帮助它在国内统治和对外关系上度过难关,也是宋美龄访美的一个重要动机。

至 1943 年,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已趋严重,其反共倾向益加明显,抗日军事日见消极化。宋美龄访美致力于为国民政府获取尽可能广泛的实际好处,却竭力为其消极抗日政策遮掩辩护,同时对中共武装的英勇抗战闭口不谈,并伺机为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游说。当时,已有许多对抗战中国有着丰富感性经验的美国有识之士确实感受到宋美龄所竭力渲染的那个“抗战中国政府”令人沮丧的现状和趋势。宋美龄访美时正在国统区考察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指出,在重庆的一年多时间使他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只是由于该政府“出色的对外宣传”和新闻封锁,才“使得美国人只能通过粉饰出来的玫瑰色来了解中国”;而宋在美国的活动又“进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国的肥皂泡”。他警告说:国民政府“在美国的被夸大了的形象,宛似一个充气过分的轻气球一样处于快要爆炸的实际危险中”。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兵)

《美国在中国的逗留》,第 50 页。

参见《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第 284—286,289 页。